

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

## Les Oubliés de la Mémoire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法] 让·勒比图 ( Jean Le Bitoux ) 著  
邵济源 译

# 「二战」时期欧洲的同性恋者

爱与黑暗



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

# Les Oubliés de la Mémoire

[法] 让·勒比图 (Jean Le Bitoux) 著  
邵济源 译

# 「黑」战 『新时期欧洲的同性恋者』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爱与黑暗：“二战”时期欧洲的同性恋者 / (法) 勒比图 (J. L. Bitoux) 著；邵济源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5

ISBN 978-7-300-21088-9

I. ①爱… II. ①勒… ②邵… III. ①同性恋-研究-欧洲-1939～1945  
IV. ①D750.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73670 号



---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    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 - 62511242 (总编室)	010 - 62511770 (质管部)	
	010 - 82501766 (邮购部)	010 - 62514148 (门市部)	
	010 - 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 - 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a href="http://www.crup.com.cn">http://www.crup.com.cn</a> <a href="http://www.ttrnet.com">http://www.ttrnet.com</a>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易丰印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规    格	148 mm×210 mm	32 开本	版    次 2015 年 6 月第 1 版
印    张	8.875 插页 1	印    次	201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214 000	定    价	28.00 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只因为我是犹太人！难道犹太人没有眼睛吗？难道犹太人没有五官四肢、没有知觉、没有感情、没有血气吗？他不是也吃着同样的食物，同样的武器可以伤害他，同样的医药可以疗治他，冬天同样会冷，夏天同样会热，就像一个基督徒一样吗？你们要是用刀剑刺我们，我们不是也会出血的吗？你们要是搔我们的痒，我们不是也会笑起来的吗？你们要是用毒药谋害我们，我们不是也会死的吗？

——威廉·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第三幕，第一场（1604）

# 目 录

---

## CONTENTS

### 001 第一章 大清洗

- 005 国会纵火案
- 008 柏林的疯狂年代
- 011 社会解放受到致命威胁
- 016 柏林的同性恋政策
- 021 危害极大的“外出郊游”浪潮
- 026 文化的浩劫
- 032 海因里希·希姆莱：一个仇恨科学的讲话
- 039 尴尬的“血腥之夜”
- 043 血腥的早晨
- 048 从“血腥之夜”到“砸玻璃之夜”
- 053 同性恋在被占领国家和地区的命运
- 060 德国和奥地利的女同性恋者的命运

### 076 第二章 仇视同性恋的可怕岁月

- 081 粉红色三角
- 086 “疯狂”医生
- 089 集中营里的“性生活”
- 095 一个艰难的任务

099 欧洲其他地区的情况

110 第三章 无忧的巴黎

- 115 巴黎的医生和警察
- 119 巴黎的夜生活和沙龙
- 124 被占领的法兰西，被监控的巴黎
- 130 达尔朗和他的土伦水兵
- 137 面对神秘凶手的达尔朗
- 144 所有人都解放了吗？
- 149 历史的不可思议的沉默

165 第四章 萨特，无须负责

- 171 安德烈·纪德和让·科克托
- 179 作家、同性恋和附敌分子
- 188 萨特与同性恋造反

204 第五章 重新认识之路

- 208 带头的无名呐喊，最初的集体行动
- 211 邦特和斯特拉斯堡事件
- 218 悼念之艰难
- 234 死者的名分
- 239 不可告人的结盟
- 242 正面人物
- 248 同性恋和公民权

266 结束语

275 译后记

# 第一章

## 大清洗

国会纵火案

柏林的疯狂年代

社会解放受到致命威胁

柏林的同性恋政策

危害极大的「外出郊游」浪潮

文化的浩劫

海因里希·希姆莱：一个仇恨科学的讲话

尴尬的「血腥之夜」

血腥的早晨

从「血腥之夜」到「砸玻璃之夜」

同性恋在被占领国家和地区的命运

德国和奥地利的女同性恋者的命运

关于同性恋问题，没有更多的话好说，我们只要记住有些丑行就够了。

——T. W. 阿多尔诺

1933年1月30日，保罗·冯·兴登堡，这位1925年上台的德意志共和国总统召见阿道夫·希特勒，让他组织新政府。时年44岁的希特勒，终于取代冯·施莱歇尔，成了德国的新总理。希特勒上台16个月之后，1934年5月30日，施莱歇尔和他的妻子在“血腥之夜”的大屠杀中惨死在自己的家中。他当时曾拒绝把总理的位置让出来。

希特勒上台6个月后，要求解散国会，魏玛共和国政府没完没了的更迭，使他很不满意。不过，在刚刚同国家主义右翼组成的新政府中，他任命了戈林和弗里克两名部长。这样一来，他就可以放手大干了。

1933年3月5日最终赢得的国会新选举并未保证纳粹党的真正优势，他们还需要开展一系列包括大量暴力和极端行为的运动。共产党和社会党的一批议员已经进了监狱。他们空下的候选人名额的转移，完全改变了选举结果。其间，希特勒也运用一些能赢得人民支持的宣传口号。但这只是他复辟大德意志的一个步骤。为达目的，他必须首先消灭从前的竞争对手，然后同“腐败的议会制”决

裂，使这个麻木不仁、毫无生气的魏玛共和国不复存在。<sup>[1]</sup>

15年来，德国人一直认为，1914—1918年战争的失败，是他们国家的耻辱。自20世纪20年代<sup>①</sup>初经济衰退以来，失业队伍越来越大。希特勒希望重工业开始起步，以便把更大规模的军工生产纳入其中。此外，近几十年间，德国人民和艺术家似乎对1917年的布尔什维克革命热情高涨。斯巴达克革命险些就成功了。这些都让希特勒寝食难安。在他看来，共产党人、社会主义者、各种协会、工会，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要毁掉德国。10年前，从他写《我的奋斗》一书以来，他就一直认为这个腐败制度的最主要获利者是犹太人：他们是给别人带来不幸的无国籍流民。

另外一些强有力决定也压在所有那些使德国出生率下降的人们身上。金字塔形的年龄统计结果表明人口遭受了巨大损失（1914—1918年间丧失了200万人），这些损失应由大量出生人口来补充。对于一个好战的独裁者来说，这尤为重要，因为他需要征用所有身体强壮的年轻人。然而，这些青年人似乎并不关心生育方面的事。很多人加入到某些青年运动之中，几十年来，他们组织森林探险和旅游，在野外庆祝友谊，欣赏阳光和裸体，远离战争和尘嚣。

与此相反，另外一些青年人则陶醉在德国大都市那种繁华舒适的生活中，这些大都市正遭受人口指数下降的困扰。

这时，在所有欧洲大城市中，到处都有人争论艺术问题，他们鼓吹抽象艺术，用他们的作品扰乱男女关系的正常表现。从青年旅馆到舞厅，从画室到渔村，所有一切，都使德国青年背离了希特勒给他们规定的使命：大量生孩子，建立一个雅利安人统治的千秋万代不朽的王国。

---

<sup>①</sup> 本书中所有年代，除特别注明的，均指20世纪的年代，下同。——译者注

正因为此，希特勒在他掌权几天之后，即 1933 年 2 月 4 日，颁布了《德国人民保护法》（*pour la protection du peuple allemand*）。此法令很快就得到加强，因为三周以后，发生了国会纵火案，德国总理借此补充该法案：禁止政党、工会、社团和各协会的活动，禁止新闻自由和游行示威。

80 岁高龄的兴登堡元帅是在 1933 年 1 月 30 日这一天正式任命希特勒为总理的。同一天，克里斯托弗·伊舍伍德，这位自从离开伦敦后就成了柏林居民的人，万万没有料到有如此大的灾难来临，在写给朋友斯特凡的信中，他大大嘲笑了这次事件：“正如你将要看到的那样，我们即将有一个包括查理·卓别林和圣诞老人在内的新政府了。”<sup>[2]</sup>还是在这一天，作家托马斯·曼在他即将离开柏林起程赴莱比锡改编圣艾修伯里的剧本《夜间飞行》之前，在日记中写道：“一大早我离开了柏林，好像是被一种不祥之兆所驱赶……晚上没有睡好，情绪很坏，我勉强看了一眼这座仍然在沉睡中的城市，这也许是我看柏林的最后一眼了。永别了，柏林。我从前离开从不向它这样说过。”<sup>[3]</sup>

这天，刚成为德国总理的希特勒，离开他居住了两年之久的凯塞勒霍夫饭店，饭店就在总理府对面，那里有他的议事厅和他的秘书组。两处相隔不过数十公尺，希特勒一抬脚就到了。他回答新闻记者的问题，同他的战斗伙伴以及楼层女服务员握手。入主总理府以后他可以解散这边的队伍了。同天晚上，数十万人组成的火炬游行队伍穿过柏林勃兰登堡桥，然后汇入威廉姆斯塔斯大道，大道两旁的楼房和阳台上，希特勒和兴登堡先后向狂热的人群挥手致意。游行队伍从离总理府两条街的法国大使馆门前经过，法国大使安德烈·弗朗索瓦-蓬塞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一条火焰的河流从法国使馆门前流过，我沉重的心充满了不祥的预感。”<sup>[4]</sup>

希特勒一整天都很高兴，他对戈培尔组织的这次检阅十分满

意。一场盛大的晚宴在总理府贵宾露台后面的豪华客厅举行。席间，人们可以看到戈林、戈培尔、罗姆、赫斯和弗兰克，他们都是这个舞台上的关键人物。希特勒预祝即将到来的大选获得成功。在各地的选举中，应当争取雷那尼地区和德国南方的中间派和天主教徒的选票，也要争取东部地区民族主义者和保守派的选票。至于国家中部地区，传统上是社会民主派、左翼人士、共产党人的势力。他们在城市的选票通通要争取过来。纳粹在柏林的集会很有效果，尽管共产党扬言要“拿下”柏林，并采取了一系列敌对行动，他们还是赢得了不少的支持。街头在打架斗殴，小酒馆里在狂欢畅饮，纳粹的讲演就在其间进行，照菲利普·苏波在巴黎 *Vu* 杂志上的描述，其成绩的突出是不容置疑的。希特勒十分满意。<sup>[5]</sup>

一周以后，他们建立了第一座集中营，即由一家工厂改建的奥里安昂堡集中营。这是纳粹主义的高效率，是他们为强迫犯人劳动而改建成的，地点就在萨克森豪森附近柏林西北 30 公里处。紧接着，1933 年 3 月 8 日，距慕尼黑 15 公里远的达豪集中营建成，6 个星期之后，大批人群来到达豪。到 1933 春季快结束的时候，已有 50 个集中营在运转了。

## 国会纵火案

1933 年 2 月 27 至 28 日夜间，也就是立法议会换届选举前 8 天，国会被烧了。纵火嫌犯很快被抓获，他是一个名叫马里努斯·冯·德尔·卢贝 (Marinus Van der Lubbe) 的荷兰籍青年，一个可怕的纵火狂。听说他是用自己的衣服浸了汽油点燃这座建筑的。两天以后警察局的报告就出来了，他们向新闻界公布细节，证明共产党人常去那里，证明这个危险的年轻人有同性恋倾向。<sup>[6]</sup>

在起诉期间，一些当时的新闻照片和一段新闻纪录影片描绘出

一个柔弱青年支离破碎的轮廓，他身穿一件花格子囚服，在他旁边，一个系着领带的人面带嘲笑的表情，很像是个警察。另一些从这名青年身上搜出的照片显示出的是冯·德尔·卢贝面带微笑的娃娃脸形象，一个头戴鸭舌帽的青年无产者。

在这场草率的诉讼过程中，记者、编辑们很少报道被告的个人情况，只简单地说这个年轻人已经被立即处死。国会被焚，这太不可思议了，而要怪罪到所有民主党人身上，好像也说不过去。政治报刊和民间新闻对这桩尴尬事件的分析非常笨拙，他们的论点相互矛盾。一方认为冯·德尔·卢贝是一个纳粹同性恋破坏分子，当然是在威逼之下，受命进行破坏。另外一方则认为他是一个仇视自由的同性恋者，他企图钻社会混乱的空子，趁机在德国鼓吹布尔什维克革命。也还有另一种议论，在这场火箭般速度的官司过程中流传开来：被城市的繁华所吸引，这位荷兰的同性恋青年没有理由不利用曾被欧洲历史征服的首都的松散、堕落的气氛。被柏林的同性恋名气所吸引，他更要到那里去进行政治活动了。

反法西斯舆论坚持认为，是这个年轻人的道德品质原因，使他改变了最初的革命信念：“冯·德尔·卢贝主要是一名同性恋者，他的行为举止像女人，他在女人和众多证人面前的拘谨和腼腆，说明了这一点。他喜欢同男性往来的兴趣是尽人皆知的。……冯·德尔同纳粹头头们之间的同性恋关系，他在物质方面的依赖性使他变得乖巧灵活因而听命于要他放火的意志。”<sup>[7]</sup>冯·德尔·卢贝的唯一不足之处是：他不是犹太人。对于同性恋者或被控为同性恋的人来说，一点儿怀疑就足够了。这是可以威胁任何一个人的可怕的政治武器。

被民间报刊和官方新闻炒作得沸沸扬扬的共产党人和同性恋者大杂烩，在1933年2月份期间，使当时方兴未艾的反抗运动和自发抗议活动变得像抽风一样，忽冷忽热，希特勒是很怕这些运动和

活动的。这种瘫痪的政治形势，由于共产党和社会党在这一悲剧性事件面前缺乏共同对策，变得对希特勒更加有利。我们觉得，这双重的指控，这政治栽赃的大杂烩，把一场正在进行的较量搅乱了。人民运动没有利用这一高涨的群众愤怒情绪，一举摧毁这块议会民主的招牌。希特勒避开了他本来非常害怕的群众愤怒的锋芒。这种像化学实验式的相互作用，既引起人民群众的反共情绪，又使他们更加仇恨同性恋。至于马里努斯·冯·德尔·卢贝，柏林法庭于1980年1月追判他无罪。<sup>[8]</sup>

在1933年2月27至28日的夜里，柏林闹市区的上空升起大片红云，它意味着德国民主的灾难，随着这座其中摆着一排排议员席位的巨大建筑的倒塌，民主也被火焰和仇恨彻底摧毁。在那著名的“金屋”夜总会门口，有多少人亲眼目睹了这片天上的红云！在金屋这个全欧闻名的同性恋聚会场所，在这个“不法”分子集中的舞厅里，有夜游神和艺术家、知识分子和有产阶级、外交官和穿异性服装的人、嫖客和妓女……有一位在布鲁塞尔大学任教的米歇尔·万谢诺先生在1984年的一次讨论会上说：“德国人当时的确认识到，同性恋这种异类生活方式的存在，会使某些人感到恐惧……这样一来，纳粹的意识形态成了最终的受益者，它可以使各不同阶层的人——从共产党直到教会——都哑口无言。”他最后说：“现政权既使那些被‘腐化堕落’吓怕了的部分德国人民放了心，又不致过分激怒真正的对手。”<sup>[9]</sup>15天之后，“金屋”被墙壁堵死，上面覆盖着他们的卍字旗。一幅当时的照片显示，在这座建筑前面，一些党卫军士兵日夜守护着一条已经荒芜的走廊。正面是一幅标语：“希特勒说到做到。”

国会大厦烧毁了。柏林的夜晚遭到纳粹警察的直接践踏，他们搜查关门较晚的咖啡厅、爵士乐俱乐部、群众集会场所，对同性恋俱乐部中人的大逮捕更是不在话下。在内政部长赫尔曼·戈林命令

下，颁布了关于通信秘密检查、禁止卖淫、禁止同性恋、关闭夜间娱乐场所等多项法令。多数情况是，一辆辆满载着全副武装的冲锋队队员的卡车，开到同性恋者聚会的地方，去执行大搜捕行动。

镇压是大规模的。2月28到29日的夜里，抓了4000名政治犯，其中1500人是在柏林城区抓的。此后，3月份逮捕了10000人。因反对纳粹政权而被投入监狱或送进集中营的，总数有25000人。四分之三是共产党员。3月3日，共产党的总书记恩斯特·台尔曼被捕，这天离国会换届选举只有两天时间。希特勒非常高兴，因为社会主义分子拒绝了共产党要他们追随其转入地下的建议。

作家克里斯托弗·伊舍伍德在那个悲惨年代生活在柏林，他的小说《永别了，柏林！》(Adieu à Berlin)描写了当时自由被剥夺的情景。1972年，鲍勃·福斯同莉莎·米纽莉、迈克尔·约克共同摄制的影片《小酒店》(Cabaret)就以其小说为蓝本。差不多半个世纪之后的1980年，这位76岁高龄的老作家在会见Gai Pied报记者时，对吉勒斯·巴伯代特说道：“我的朋友们那时总爱说，希特勒根本没有可能长久执掌政权，因为只要有一次大罢工，就会立即把他扫地出门。不过这种理论上的推测，与实际情况相去甚远。令人意想不到的现实是：同性恋者对纳粹主义上台，没有进行丝毫有效的抵抗。”克里斯托弗·伊舍伍德很快就要离开柏林回伦敦去了，他最后离开伦敦去美国定居。他补充道：“我对当时的政治形势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当时英国的同性恋者生活在奴隶般的状态之下。所有的人都缄口不言。不久，我回到了伦敦，开始了完全自由的生活。”<sup>[10]</sup>

## 柏林的疯狂年代

柏林的人口增长速度是非常惊人的，19世纪20年代的经济危

机促其贫穷的郊区范围进一步扩大后，尤其如此。1845年柏林有50万人，1871年为100万，1900年又翻了一番。到1920年，柏林已有400万居民，成为欧洲人口最稠密的首府。它同时也是一个年轻的城市，犹太人在那里非常集中。在它的郊区，自从20世纪初义务兵役制实行以来，兵营周围开了很多专为大兵服务的小酒馆。士兵性交易的事常常发生，特别在蒂尔加滕公园，他们在那里同男妓们一起，享受着园中的林荫小道。此外，在整个20年代，每到冬天，每周都要举办男同性恋者的舞会，其中有些人一晚上要赶好几场，特别在柏林狂欢节期间，欧洲人都到那里去聚会。<sup>[11]</sup>

盖伊·奥克汉姆，这位70年代同性恋运动的代表人物，赋予同性恋者一个固定名称，他说：“到18世纪初有一种城市现代文化逐步形成，这就是同性恋。那时，伦敦出现了反常性行为的秘密俱乐部，他们有自己的活动地点，有自己的行规……一直要到19世纪末，这种性倒错的行为方式才被其他人所认识，才第一次被医生、法学家、政治人物所接受，性关系的异端从此成为社会现象。总之，同性恋的产生，源于现代都市的发展和性心理知识的出现。”<sup>[12]</sup>

1900年，柏林有30家同性恋酒吧，到1933年就增至130家，比巴黎现在还多。也有一些文学团体，如罗汉克林俱乐部和哲学家社团。还有“男人专场”的夜间演出，专演一些滑稽搞笑的同性恋内容的节目或当时较为流行的戏剧。在巴黎，那位被让·科克托所欣赏的专门反串角色的美国人巴贝特也同样吸引大批观众。这位舞蹈家和杂技演员不久之后在马雷区也有了自己的剧场。在柏林演出的《汉娜·斯图尔姆》，完全是《让娜·藤佩特》的翻版，此剧最初在“金屋”上演，令很多在夜间寻乐的柏林人陶醉过。

1931年，巴黎一家以讽刺幽默闻名的报纸《小钢炮》对德国首都那种既疯狂又刺激的活动发生了兴趣，赶紧向那里派去几名记

者，通过奥斯卡·梅泰尼耶的文章，我们看到了对另外一个著名的同性恋夜生活场所“德雷斯内·卡西诺”的描写：“我眼前是一片四百到五百人形成的五颜六色的人海，人海中发出美妙的交响乐声音。每个舞者都是男扮女装。在色彩斑斓的人海中，偶尔可以看见几个流动着的黑色斑点，原来是一些身穿制服和晚礼服的警察，他们一脸严肃，也参加到这一纯粹由男人组成的晚会中，又唱又跳。”女同性恋的夜总会“玛丽”和“英奇”，《小钢炮》的记者也没有放过：“在那儿，环境设施和谐优雅，非常适合众多美女冶游其间，周围的颜色主要是酱紫色和珠灰色，有一个琳琅满目、供应丰富的吧台，座椅都是深色的。我们走进去的时候，已经有一些女人在那里了。”一家同性恋小报也刊登了一些分析评论文章、连载浪漫小说以及一些夜生活的新闻报道。一家名叫《友谊报》的杂志上面刊登着这样的启事：“水兵寻求男性伴侣”或“男青年，27岁，征求一位强壮男子为性伴侣”。

同性恋者生活在一起，纵情声色，享乐达到了极致。他们的人数和性质很难确定，正如费里克斯·亚伯拉罕亲眼所见后所描述的：“大多数同性恋者都在某个团体当中。在柏林，我们看见有胖子俱乐部、秃子俱乐部、光棍俱乐部，那么，为什么不能有一个专门为仇视女人的人提供相聚场所的俱乐部呢。”也有小胡子团体，但他们也欢迎留大胡子的人，他们常常组织数百人规模的50岁以上老人的聚会，这些老人风度翩翩，丝毫不逊色于那些嘴上无毛的青少年，他们在那快乐消闲，通宵达旦，一晚上喝掉无数公升的啤酒。在一些体育竞赛协会的酒店中，人们鼓励那些身健貌美的青年进行色情表演，帅哥们的性感刺激的紧身衣裤，非常具有挑逗性。表演常常掏光观赏者的腰包。《小钢炮》最后一篇报道是20世纪30年代初发表的，标题是《致小雄狮》：“这是一家美国西部式的小酒

馆，天花板上挂满了万国旗，乌烟瘴气，乱七八糟，简直就是一个疯人世界。服务员是清一色的‘小狮子’，其实，就是一些18到20岁的身体健壮、精力充沛的小伙子，他们身穿水兵服，在那些爱好男风的顾客中间忙碌着。”<sup>[13]</sup>

科莱特的第一任丈夫威利在1927年对柏林的小酒店有过另一番描写，文章比较含蓄但不无幽默感，指的就是克里斯托弗·伊舍伍德曾经提到过的、位于一个工人区的科西·科迈尔酒店。他说：“旅游者都不愿到那里去，他们认为那里不安全。其实，这家酒店接待的都是一些老主顾，格调一点也不低下：四周墙上挂着拳击手和自行车运动员的照片，来者多数是年轻的失业工人，他们身穿皮夹克，衬衣敞开露出肚脐眼儿，衣袖挽得高高的，在那儿一边玩扑克，一边等待顾客。”威利还一再描写卡尔斯巴德咖啡馆：“整个大厅塞满了男人，大多是吵吵嚷嚷、高谈阔论的年轻人，他们手舞足蹈，动作极其夸张。一个因吸食吗啡而瞳孔扩大的少年，在大厅中间扭来扭去。他穿一件短外衣，里面光着上身，两条腿也裸露着，脚上穿着一双凉鞋。”<sup>[14]</sup>

在王子大道，有大歌舞厅、时尚的啤酒馆以及首都最大的电影院，正如旧时照片所展示的那样，一些女同性恋者和男同性恋者旁若无人地在那里散步，他们和她们充满自信，认为自己已完完全全融入了这个社会。<sup>[15]</sup>吉勒斯·巴伯代特在*Gai Pied*报上，追忆这个疯狂年代时写道：“最使欧洲人感到震惊的德国文化现象，就是同性恋。欧洲人看到了他们永远不想看到的莱茵河彼岸的现实。”<sup>[16]</sup>这种令人震惊的都市文化的涌现，来势汹涌，清晰可见。<sup>[17]</sup>

## 社会解放受到致命威胁

这种社会解放的动力对于同性恋者来说，不是孤立的，也不是